

【比较研究】

从世界民族问题发展态势深刻理解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蒲长春

【摘要】世界民族问题呈现出三大发展态势,即表现的碎片化加剧、成因的叠加性加深和治理的复杂性增强。碎片化体现为主体、诉求和方式更多元;权力失衡、认同危机、发展鸿沟三大根本性问题共同作用,引发具有共性和通性的世界民族问题;世界各国采取了规范权力、塑造认同和促进发展等治理路径。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态势和治理逻辑,透现出民族问题形成的一般性结构特征和作用规律。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应对了世界之变,回应了治理困局,提供了中国方案:维护“大家庭”原则以防范权力失衡;坚守“石榴”原则以防范认同失衡;运用“钥匙”原则以防范发展失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世界民族问题;中国道路;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蒲长春,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员,从事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研究(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贵州民族研究》(贵阳),2023.6.44~50

【基金项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级课题“世界民族问题发展趋势”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1](P507)}这一历史方位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交错演进,如何顺应世界大势、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民族工作必须回答的世界之问和中国之问。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为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既具有个性,又具有共性。世界民族问题发展态势是世界大势的重要方面。把握世界民族问题发展态势,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把握领会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一、表现:全面碎片化加剧

如果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比作一种地壳板块运动,那么,世界民族问题就是大小板块之间碰撞冲击形成的现象。历史地看,世界民族问题总与世界

政治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霸权的扩张和解体,总会引发影响重大的民族问题。当前世界民族问题之所以呈现出全面碎片化加剧的趋势,就在于世界正处在板块大碰撞、大裂变之后的缓冲期,小的板块在持续游离、动荡,新的板块在不断重组、形成。

(一)主体更多元

首先,涉及国家多元。不管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民族问题都呈现出不断增多加剧的趋势。美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交会,引发了新一轮反全球化运动。西班牙、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大都采用了公投形式,试图分裂国家。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缅甸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民族问题与国家危机共振的恶性局面。

其次,波及种族多元。广义的民族问题包含了种族问题。种族问题仍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根深蒂

固、影响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2014年美国发生弗格森事件,时任总统奥巴马说:“这不是费格森的问题,这是整个美国的问题。”^[2]2011年挪威发生7·22惨案,2017年8月美国发生夏洛茨维尔事件,2020年5月明尼苏达州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及后续发酵都因文化和种族问题而起,冲突已不再局限在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

第三,关联宗教多元。世界民族问题绝大多数和宗教因素相关联。比如发达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和难民问题,就纠缠着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认同矛盾;发展中国家印度的民族问题关涉到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之间的冲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更是打着宗教旗号,死而不僵,散而不灭,持续在世界各地制造暴力恐怖事件。

(二) 诉求更多元

第一类是霸权和反霸权诉求。霸权主义造成的发展差距、贫富悬殊、阶级矛盾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民族问题。2015年难民危机以及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从根源上看,实质上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霸权的后遗症或并发症。这一对力量将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以新的形式在世界民族问题中发酵、膨胀和爆发。

第二类是公正和排外诉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劳动力要素的世界性流动加快,世界范围内的移民已成为常态。2020年,全球国际移民人口达到将近2.81亿,占全球人口3.6%^[3]。移民对于公民权利、社会公正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而与此同时,本国国民的排外倾向伴随着福利资源压力和就业焦虑,也越来越强烈,甚至走向极端。

第三类是自治独立与统一整合诉求。沙俄帝国解体之后,前沙俄帝国的版图上出现了近70个独立国家或政权。当时列宁在建国模式上选择了联邦制,以作为“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4](P816)}。但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实质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复归到帝国的霸权模式,导致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苏联的民族国家整合失败。

(三) 方式更多元

世界民族问题的状态可分为三类。一是“活火

山”态,即正在爆发过程中,运用了暴力等激烈方式;二是“休眠火山”态,即各种矛盾处在酝酿状态,多运用非暴力的方式;三是“死火山”态,即冲突已经爆发结束,各种力量达到相对平衡。当然,三种状态有时也会相互转化。

首先,从“活火山”角度看,地区或民族势力组建反政府武装与所在国家政府直接对抗,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事件也多有民族宗教背景。两股极端主义势力正在欧洲本土猛烈冲撞:一是伊斯兰教极端势力,裹挟和煽动欧洲本土的边缘穆斯林群体,借助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制造社会动荡;二是欧洲的极右翼势力,纵容民间的极端排外和民粹组织,不断制造所谓仇杀事件,左右欧洲各国的政治方向。两股极端势力已经进入“恐惧—报复—恐惧”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撕裂欧洲。

其次,从“休眠火山”角度看,发达国家的民族分离力量多采用制造舆论、游行抗议、创制法律、组建政党、参加选举、进行公投等方式,逐渐获取分离势能,争取高度自治甚至独立,冲击国家板块。民族政策、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乃至语言文字、历史记忆等,都可能演变为重要问题或冲突焦点,引发矛盾,积累仇恨,切割社会,形成新的身份政治,有可能演变为“活火山”。

最后,从“死火山”角度看,冷战结束之后,全球范围民族国家之间的重塑式碰撞运动已大体结束,短期内不会出现国家的集群式解体和重构。但随着板块碰撞、裂变不断积累,持续演进,有的民族问题可能“借尸还魂”,存在重新激活“死火山”的可能性。

二、成因:多维叠加性加深

世界民族问题的形成非常复杂,涉及因素很多。最核心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权力因素,即“力”的因素;二是认同因素,即“理”的因素;三是发展因素,即“利”的因素。正是因为出现了权力失衡、认同危机、发展鸿沟三大根本性问题,才引发了世界民族问题。

(一) 失之于“力”:权力失衡

权力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失衡,二是国内政治格局的失衡。

从国际角度看,首先,大国博弈强力左右民族问题。俄乌危机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地

缘政治博弈的结果。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的要塞,同时也是俄罗斯重要的安全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而乌克兰存在严重的二元分割。东部是工业区,多数信东正教,俄罗斯族分布多,亲俄罗斯;西部是农业区,多数信天主教,亲欧美。东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多数是俄罗斯族。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略选择与乌克兰自身的二元化,有深度契合。

其次,霸权主义深刻形塑民族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力推行民主价值观,破坏原生国家的权力平衡,制造了无休止的内乱和严重的民族问题。9·11之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煽动并参与了叙利亚内乱,原本维持着基本“政治生态平衡”的中东变成了全面失序、各种力量纠缠冲突的动荡地区,反恐战争催生了最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大批难民涌入欧洲。

从国内角度看,一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撤销了联邦的计委、农业部、工业部。70年代,又修改宪法,进一步把大部分政治、经济权力下放到各共和国。1963年的宪法规定:“联邦与共和国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较大的自治单位与其内部较小的自治单位之间的关系。”^{[5][P26]}

二是国内民族政策的失误。二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0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为由,把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整个民族驱逐到中亚^[6]。

三是政党民族化或地区化。1968年,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裔组建了魁人党,在1976年赢得大选,党魁莱维斯克出任省总理,从而为全民公投铺平了道路。2011年,苏格兰民族党以多数党的优势执政。2012年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萨蒙德和卡梅伦签了《爱丁堡协议》,确定了2014年9月18日公投。2022年6月28日,英国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在苏格兰议会提议,将于2023年10月19日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2023年3月继任者巴基斯坦裔的哈姆扎·优素福依然坚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拆散英

国”。这些主张独立公投的政党代表的是特定地区的利益。政党或地区之间的竞争变为了国家分裂困局。

(二)失之于“理”:认同危机

认同问题离不开三个核心问题,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是谁”是从主体角度看认同。从认同心理看,有三种心理会深刻影响认同。一是相对剥夺感会降低国家认同。有两种情况,一种认为自己本来应该更富。如苏联的俄罗斯族,认为自己的利益被其他少数民族“掠夺”,充当了“奶牛”。另一种认为自己本来不应这么穷。认为自己有优势自然资源,结果被中央掠夺,被其他民族瓜分。这种情况类似于“资源诅咒”,实质上分别形成了“优势认同诅咒”和“弱势认同诅咒”。富要分家,穷也要分家。二是被歧视感会降低国家认同。如参加“伊斯兰国”的所谓外国战士。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出生和成长于西方发达国家,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之所以加入“伊斯兰国”,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备受主流社会的歧视。“伊斯兰国”能够提供尊严重构的机会^[7]。三是被隔离感会降低国家认同。如欧洲的穆斯林群体,虽然已经在经济层面结构性融入,但是没有完成在文化层面的社会性融入,造成了被主流世界隔离的平行生活世界。德国人对穆斯林多持批评态度^[8]。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是从时间角度看认同。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因素,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殖民史人为制造民族问题。殖民者利用被统治民族内部的民族、宗教差异和发展差距,实行“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等治理策略,制造被殖民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巴以冲突、印巴分治、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冲突、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杀,等等,都是殖民的后遗症所致。二是自治史深刻影响民族认同。例如英国的苏格兰有八百多年的自治历史,多数苏格兰居民只认同自己的苏格兰身份^[9]。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从1449年到1783年有300多年作为独立的汗国存在^[10]。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从16—18世纪也有200年一定程度的自治历史。这些地区或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政治认同都深刻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三是关系史时刻唤醒民族记忆。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有民族之

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存在彼此征服、对抗。这些历史记忆有的已经凝固,有的则作为政治整合和民族凝聚的资源,随时都有可能根据时势需要解冻融化,形成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失之于“利”:发展鸿沟

从国际层面看,不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激化了民族冲突。自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依仗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优势,强行把广大非西方国家纳入西式全球化进程,通过投资、贸易及殖民掠夺等方式,从非西方国家榨取大量财富,使广大非西方国家长期贫穷落后,造成西方与非西方经济、政治发展的极度不平衡^[11]。2020年,全球财富顶层的10%人群的财富占比高达75.47%,而底层50%人群持有的财富占全球财富不足2%^[12]。

从国内层面看,不平衡的国内经济体系是民族问题的重要诱因。比如比利时的弗拉芒大区和瓦隆大区发展差距巨大,弗拉芒大区每年要向瓦隆大区输血100亿欧元^[13]。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虽然只有750多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6%,面积只占6.3%,但是人均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五分之一,号称是西班牙的“经济发动机”^[14]。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经济理由是北海油田的收益。苏格兰民族党认为,如果按照渔业分界线划分,苏格兰将获得95%的海上油田和60%的气田,而北海油田未开发的潜力有120亿到240亿桶,价值高达1.5万亿英镑^[15]。

权力失衡、认同危机和发展鸿沟三大因素,实质上复杂层叠、交互作用:世界发展总体上的不平衡导致了全面性的权力失衡,而权力失衡引发了全球霸权,从而激发起世界范围的认同危机。而认同危机又反过来成为权力斗争的资源,通过权力再分配,再形成新的发展鸿沟。因此,三大因素互为因果,互相转化,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动力系统。

三、治理:系统复杂性增强

(一)法治:规范权力

针对权力失衡问题,很多国家一方面通过订立国家间条约尽可能规范国际关系,寻求国际合作,规避博弈风险。另一方面,运用法治手段预防、控制和打击民族分裂势力。

首先,拆除后门,消除隐患。苏联解体后,俄罗

斯曾经面临车臣问题的困扰,为稳定国内局势,1993年12月俄罗斯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抛弃“双重主权论”,规定主权仅属于俄罗斯联邦;剥夺联邦主体的“自由退出权”;禁止以暴力方式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2003年通过的车臣新宪法规定,车臣是俄联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法律上瓦解了车臣分裂主义政权的合法性^[16]。

其次,增设关卡,阻断进路。1995年魁北克独立公投之后,1998年8月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的“魁北克咨询意见书”出台,阐明了四大原则,即联邦主义原则、民主政治原则、宪政主义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根据这四条原则,魁北克在法律上不能仅用民主权利的原则片面地、单方面地宣布从加拿大联邦分离出去,因为这样做会侵犯到加拿大其他省份相同的民主权利,而所有省份都是加拿大联邦的组成部分^{[16](P250)}。这就从法律上极大限制了魁北克的独立。

第三,依法处置,打击分裂。针对加泰罗尼亚公投事件,西班牙政府根据宪法第2条“西班牙国家的不可分裂”条款,向宪法法院起诉公投违宪,占据法律上的制高点,再迅速依法打击独立派,启动了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宪法法院裁定(判决)、中央政府警告、参议院表决、总检察官启动违宪调查等。最后公投领导人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被迫逃往比利时寻求政治避难^[17]。

(二)文治:塑造认同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采用过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方式,这些方式本质上都是为了塑造认同。

种族主义和同化主义给被殖民和被压迫民族带来过深重苦难,直到现在仍然是世界民族问题的主要推手。多元文化主义的提出有其历史进步性,它承认少数民族或者边缘族群的文化差异,也试图维护这些民族或族群的权利,但存在很大局限性。

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先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1971年确立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紧随其后。20世纪70年代左右,因为战后社会发展需要和移民形势的逼迫,以及政党政治的推动,欧洲也施行了多元文化主义。但一定程度上讲,多元文化主义是欧洲的一种经济策略或

政治妥协。2010年之后,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相继声称本国多元文化政策失败,其重要的原因是多元文化主义形成和主流文化相互隔离、各自运行的多个平行世界。9·11之后,加拿大将多元文化主义调整为“整合性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群的“公民整合”^[17]。在宣称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之后,英国还采用过“共同体凝聚政策”,加强对国家或地方的身份认同,但实施并非一帆风顺^[18]。

(三)利治:促进发展

发展鸿沟是民族问题产生的核心原因之一。很多国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缩小差距、加快发展、特殊化政策扶持等方式。

加拿大联邦给予魁北克省的财政平衡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魁北克经济落后于加拿大其他地区。魁北克政府一方面大量发行政府公债,另一方面只能靠加拿大政府的财政平衡拨付应对赤字。自20世纪70年代联邦平衡拨付在魁北克省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在20%以上,是魁北克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的重要来源^{[19][P162]}。

美国的教育平权政策,实质上就是针对少数族裔的一种补偿性政策。1964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平权法案》作出规定:任何接受联邦资助和合同的大学、企业和各类机构必须禁止种族歧视,并且要在教育、就业和合同分配中对少数族裔予以特殊照顾和补偿性优惠^[20]。2014年“哈佛大学招生歧视亚裔案”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2023年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公平招生组织诉哈佛大学校长及董事案”中以6:3的票数判决: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的“平权行动”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21]。教育资源如何公平配置仍然是美国教育的一大课题。

给予特殊化政策扶持。克里米亚入俄之后,俄罗斯制定了《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202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联邦纲要》计划书。根据此纲要,至2020年前,联邦将总投资达7000亿卢布(约合200亿美元)来助力克里米亚的发展,其中,俄联邦预算拨款6600亿卢布(约合189亿美元)。从实际效果看,克里米亚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8.5%、6%和10%,远高于整个联邦的发展水平^[22]。

四、防范风险,坚定自信

反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在应对挑战、解决问题、争取人心、取得实效上总体是成功的,这一成就蕴含着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逻辑、制度密码和价值指向,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真理性。要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和实践途径,增强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化解风险的能力。

(一)防范权力失衡,维护“大家庭”原则

制约民族问题的权力关系有三类,即国际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大家庭”原则就是指一致对外、众星捧月,众志成城。

首先,妥善处理大国关系,抵御利用民族宗教问题的西化、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面临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以及内部事务国际化的严峻考验,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用来牵制、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民族宗教工作涉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要以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以宗教和睦反对宗教极端,持续构筑思想防线,修筑精神长城,维护国家统一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和中华民族大团结。

其次,恰当规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运用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运用好这一制度的关键是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在坚持中完善,在完善中坚持。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时与势的变化,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要更强调中央政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坚决维护好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上,要更重视增进共同性和向心力,把握好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

最后,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着力使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成长为胸怀大局的国之栋梁。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更肩负传递贯彻国家意志的重大职责。衡量是不是新时代好干部,就是要看能不能坚决维护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不能明辨大是大非立场,能不能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到行动中去,有没有对各族群众的真挚情感。一定要防止以民族划界形成

权力圈子,防止以民族为界进行攀比算计,造成“兄弟不和”;防止出现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不论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都应立足国家整体利益,着眼中华民族大团结。

(二)防范认同失衡,坚守“石榴”原则

妥善解决民族问题,正确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是关键。“石榴”原则就是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各民族优秀文化集大成的文化观、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观。

第一,培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特色,又是优势。一体就是指中华民族整体,多元是指构成这一整体的各个民族。一体是石榴,多元是石榴籽,石榴和石榴籽不可分离,石榴籽之间也不可分离,中华民族是会融一体、有机关联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各民族的血脉筋骨早已融为一体,生生不息。纵观世界民族问题,民族认同出现问题有两种情况,一是多元消灭一体,多元相互平行隔离;二是一体消灭多元,一体变为民族同化和政治强化。因此,要防止“消化”各个民族,又更要防止“虚化”中华民族。尊重差异,绝不意味着强化差异、固化差异和扩大差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强化石榴这个整体的意识。

第二,树立各民族优秀文化集大成的文化观,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集中了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成为兼收并蓄、兼容并包又独具特色的有机整体,反过来滋养哺育了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是主干和枝叶的关系。没有主干的会融支撑,枝叶必将干枯飘零,而失去枝叶的主干,也将独木难支。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不能唯我独尊,彼此相轻,只有包容互鉴,才能繁荣一体。多元文化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化,又让各民族文化孤立发展。

第三,正确认识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观,构建中华民族历史认同。世界民族问题说明,割裂甚至冲突的历史叙事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记忆,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民族分离的动因。中华民族的历史不等

于某一个民族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都为灿烂的中华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做出过贡献。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历史,要强调历史进程和历史贡献的一体性和共同性,增进对一体性和共同性的体认,防止形成独立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历史叙事。

(三)防范发展失衡,运用“钥匙”原则

发展失衡是民族问题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另一方面“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钥匙”原则就是指实现高质量发展。

首先,全面提升综合国力。世界民族问题中涉及的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弈问题,正是根源于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弱小落后就可能成为他国棋盘上的棋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发展理念,构建发展格局,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

其次,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若持续加大,容易出现发展差距和民族地区特殊性叠加的情况,造成民族关系或地区关系的失衡,进而演变为民族问题。过去一些政策举措,虽立足民族平等和公平正义,但随着时代发展和情况变化,已经不符合实际,有必要审慎有序进行调整、优化、更新,提高针对性和精准度,使其更契合差别化的实际情况,不断缩小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让各族群众都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汲取类似美国“铁锈地带”被遗忘的教训。

最后,做好城市民族工作。世界民族问题多产生、发酵于城市。我国各民族的跨区域大流动进入了活跃期,少数民族如何更好适应城市、融入城市,成为新时代的重大课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既是自然客观的,也可有所作为、能积极推动,应主动谋划,在城乡建设布局、公共服务配置等方面,统筹考虑,顶层设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应体现在生产生活空间上、经济社会活动中,更应致力于缩小心理距离、营造共同的精神、情感和文化空间,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式嵌入。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 [2]李拯. 弗格森事件引燃美国种族主义[N]. 人民日报, 2014-11-28(5).
- [3]李明欢. 逐梦留根: 21世纪以来中国人跨国流动新常态[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23, (3).
- [4]列宁. 列宁论民族问题(下册)[M].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7.
- [5]郝时远. 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中的民族危机[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
- [6]左凤荣. 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0, (2).
- [7]李宁. “伊斯兰国”影响下的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分析[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5, (6).
- [8]陈壮鹰, 马绎. 当代德国穆斯林移民融入方式和状况考察[J]. 国际观察, 2018, (3).
- [9]周少青. 西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批判与反思——以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独立运动为例[J]. 世界民族, 2018, (1).
- [10]苟利武. 乌克兰的族群分离与治理——以克里米亚问题为例[J]. 俄罗斯研究, 2018, (6).

- [11]林利民, 张蓓. 当前欧美乱象及其根源与未来走势[J]. 当代世界, 2017, (11).
- [12]李实, 陶彦君, 詹鹏. 全球财富不平等的长期变化趋势[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4).
- [13]任宇. 比利时要分裂? [J]. 世界知识, 2007, (24).
- [14]余翔. 苏格兰, 独立得起吗[J]. 世界知识, 2014, (5).
- [15]张仕荣. 基于国际经验构建中国反分裂战略体系的几点思考[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1, (6).
- [16]周少青. 民族政治学: 加拿大的族裔问题及其治理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17]王建波. 加拿大哈珀政府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因[J]. 世界民族, 2018, (5).
- [18]韦平. 多元文化主义之后: 英国的共同体凝聚政策[J]. 世界民族, 2019, (2).
- [19]刘泓. 当代国外民族分离主义与反分裂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20]孙碧. 平权运动误伤亚裔? ——当代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种族配额”与“亚裔歧视”[J]. 比较教育研究, 2018, (2).
- [21]江振春. 美最高法院判决大学“平权行动违宪”[J]. 世界知识, 2023, (15).
- [22]郝赫. 乌克兰危机后克里米亚发展现状评析[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8, (6).

Understand the Right Path to Solve Ethnic Probl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Examining the Global Situation

Pu Changchu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issues in the world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major trends: increasing fragmentation in their manifestations, deepening complexity in causes, and heightened intricacy in governance. Fragment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greater diversity of actors, demands, and approaches. Three fundamental factors—power imbalance, identity crisis, and development disparities—generate ethnic problems that shar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orl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dopted governance strategies such as regulating power, shaping identity,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The trends and governance reveal the general structure and rules underlying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problems. China's right approach to addressing ethnic problems responds to the changing world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and offers a China-style solution: preventing power imbalances by upholding the "big family" principle, preventing identity imbalances by adhering to the "pomegranate" principle, and preventing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by applying the "key" principle. These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creative proposal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global ethnic problems; China's approach; Xi Jinping;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